

文章编号: 1671-6523(2011)01-0060-07

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增收效应

——基于农户模型的模拟研究

吴连翠^{1,2}, 陆文聪²

(1. 浙江大学 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 浙江 杭州 310029; 2. 浙江大学 管理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29)

摘要: 依据安徽省的农户调查资料,采用数学规划方法,构建农户模型,模拟研究粮食补贴政策在不同情景条件下对农户粮食增产和家庭增收的促进效应。模型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增产和家庭增收的促进效应,随着补贴标准、农产品价格以及土地经营规模的提高而明显增强;随着要素投入成本增加而明显下降,并且要素投入成本增加对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的负面影响超过粮食补贴政策的正面效应。建议加快农村土地流转,提高粮食补贴标准,改变粮食补贴政策操作模式,逐步建立与农产品价格、尤其是生产要素价格的联动机制。

关键词: 粮食补贴政策; 增产增收; 农户模型

中图分类号: F326.11 文献标志码: A

The Effect of Food Subsidies on Increasing Grain Production and Income——A Simulation Study Based on the Household Model

WU Lian-cui^{1,2}, LU Wen-cong²

(1. The Center for Agricultural and Rural Develop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2. College of Manage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9,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ata from a household survey in Anhui Province,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 household planning model to simulate promotion effect of production and income of food subsidies under different scenarios. Model results show that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food subsidies to farmers increases as the subsidy standards, agricultural produce price and the scale of land management grows and decreases significantly as the input factor costs rise, and that the negative impact of factor input costs increase faster than the positive effect of food subsidies. It proposed that rural land transfer should be quickened, food subsidies standard improved, and the mode of food subsidy operation changed in order to establish, step by step, a mechanism that coordinates agricultural food prices, especially the input factor's price.

Key words: food subsidy policy; increasing production and income; household model

粮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物资,在保证国家粮食安全方面承担着重要的责任,没有粮食产量的稳定提高,整个国民经济无法持续快速的协调发展。为了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保障国家粮食安

全和种粮农民利益,2004年以来,中国政府相继出台了粮食直接补贴、农资综合直补、良种补贴、农机具购置补贴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初步形成了粮食综合性收入补贴和生产性专项补贴相结合

收稿日期: 2010-12-16 修回日期: 2011-01-26

基金项目: 浙江大学卡特研究中心“985”工程二期研究生项目

作者简介: 吴连翠(1980—),女,博士生,主要从事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 E-mail: wuliancui2010@163.com。

的粮食补贴政策体系^[1]。粮食补贴政策实施以来,政策的实施效果成为相关学者关注和争论的焦点。理论上讲,粮食补贴政策有利于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但是实际效果能否达到理论的预期效果一直存在着较大的争议。

有些学者^[2-4]认为,粮食补贴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种粮积极性,具有明显的粮食增产效果。但也有些学者认为,政府实行的低水平的粮食补贴政策不足以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的效应并不明显^[5-10]。国外学者^[11-12]的相关研究也表明对于“脱钩”的直接补贴政策,难以实现理论上对粮食生产的刺激作用。国内现有的研究文献,在研究视角上,大都主要考察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粮食生产和种植业收入的直接影响问题,忽视粮食补贴政策将可能诱发农户生产要素投入变化及其对家庭收入的间接影响,也没有考虑粮食价格、要素价格和土地经营规模等因素的变化。在研究方法上,大都基于统计数据 and 调研数据的描述性分析,研究粮食补贴政策实施前后和补贴标准变化对农民粮食生产和收入的影响问题,尚未充分考虑到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农业生产行为乃至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

鉴于此,本文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塘溪村的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数学规划方法建立农户模型,模拟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在补贴强度、粮食和要素价格以及土地经营规模变化情景下对农户粮食生产和家庭总收入的影响,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增收效应,并据此进一步提出相关的政策启示。

一、农户模型的构建与说明

农业政策通过影响微观农户的生产行为来实现其政策效果,农户生产行为的改变是自然条件、经济、技术、政策等一系列影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因此,学术界普遍采用数学规划方法,通过对外生性政策变量影响模型结果的模拟分析,来客观评估农业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为了分析现行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采用数学规划方法,构建一个体现中国农户生产特点的农户模型,模拟研究农户在现有家庭要素资源条件下,如何根据国家粮食补贴政策的变动来调整家庭生产行为以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构建的农户模型如下:

目标函数:

$$\text{MaxIncome}_{total} = \sum (p_i q_i - C_i + \text{subsidy}_i) X_i +$$

$$\text{subsidy}_g + \sum w \times \text{labor}_{\text{nonfarm}} \quad (1)$$

$$\text{Income}_{\text{farm}} = \sum (p_i q_i - C_i + \text{subsidy}_i) X_i + \text{subsidy}_g \quad (2)$$

$$\text{Income}_{\text{nonfarm}} = \sum w \times \text{labor}_{\text{nonfarm}} \quad (3)$$

约束条件:

$$\sum_i X_i \leq f \times \text{land}, \sum_j X_j \leq \text{land} \quad (4)$$

$$\sum_i X_i \times C_i + \text{othcost} \leq \text{income}_{\text{farm}} \quad (5)$$

$$\sum_i X_i \times \text{labor}_i^{\text{rep}} \leq \text{labor}_{\text{farm}} \quad (6)$$

$$\text{labor}_{\text{farm}} = \sum_i (D_{bi} \times l_{1i} + D_{mi} \times l_{2i}) + \text{hire}_{\text{farm}} \quad (7)$$

$$\text{labor}_{\text{all}} = m \times l_{\text{all}} + \text{hire}_{\text{farm}}, \text{labor}_{\text{nonfarm}} \leq \text{labor}_{\text{all}} - \sum_i X_i \times \text{labor}_i^{\text{rep}} \quad (8)$$

$$\sum_k X_k \leq \sum_j X_j \leq \text{land} \quad (9)$$

$$\text{land} \times \alpha \leq X_i \leq \text{land} \times \beta (\alpha < \beta < 1) \quad (10)$$

$$\sum (q_g \times X_g) \geq \text{pop} \times Q_p + X_g \times Q^{\text{seed}} + Q^h \quad (11)$$

目标函数为农户家庭总收入 (Income_{total}) 最大化,即农业收入 ($\text{Income}_{\text{farm}}$) 和非农业收入 ($\text{Income}_{\text{nonfarm}}$) 之和最大化,本文以种植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之和最大化来替代,主要是基于种植业收入和外出打工收入在农户农业收入和非农业收入中占有绝对的比重,同时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种植业生产和外出就业行为影响也相对较大。其中,不同形式的粮食补贴构成农户种植业收入的一部分, Subsidy_i 、 Subsidy_g 分别表示与实际种植面积挂钩和脱钩的补贴。模型的决策变量是各种作物的播种面积 (X_i)。

式中 i 代表农作物品种, p_i 为第 i 项产品的单价, q_i 为第 i 项作物的单产; C_i 为第 i 种作物的单位可变成本; w 为非农劳动工资率; $\text{labor}_{\text{nonfarm}}$ 为农户可以提供的非农劳动时间; land 为家庭耕地面积; f 为复种指数; j 为生产周期有交叉的农作物; othcost 为种植业生产中其他可变投入成本; $\text{income}_{\text{farm}}$ 为农户全年种植业收入; $\text{labor}_i^{\text{rep}}$ 为第 i 种作物单位面积需要的劳动时间投入; $\text{labor}_{\text{farm}}$ 为农户可以利用的农业劳动时间; D_{bi} 、 D_{mi} 分别为第 i 种作物农忙和农闲时单位劳动力的工作时间 (d); l_{2i} 、 l_{1i} 分别为农户在农忙和农闲时可以提供的劳动力人数; $\text{hire}_{\text{farm}}$ 为农户全年雇用农业劳动时间; l_{all} 为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 m 为一个劳动力全年可以提供的劳动时间 (d); $\text{labor}_{\text{all}}$ 为农户全年可以利用的劳动时间总量; j 和 k 分别表示生产周期有交叉的农作物,且 j 为 k 的紧前农作物; q_g 为粮食作物的单产; X_g 为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 pop 为家庭农业人口; Q_p 为农业人口人均年粮食消费

量 Q^{seed} 为粮食作物单位面积用种量, Q^h 为农户年均粮食储备量。

(4) 式是耕地面积约束条件,即农户全年种植的全部作物的播种面积之和不能超过农户可能的总播种面积,且生长周期有交叉的农作物播种面积之和不能超过总耕地面积;(5) 式是资金投入约束条件,即农户全年种植业生产投入资金总额,包括生产和销售过程中发生的一切费用,以来自种植业的收入为上限,不能超过全年的种植业总收入;(6) 式、(7) 式和(8) 式是劳动力投入约束条件,一方面,农户在各种农作物上的劳动时间投入总和不能超过农户可以利用的农业劳动时间,及农户在各种农作物农忙和农闲时提供的劳动时间和全年家庭雇佣农业劳动时间。另一方面,农户可以提供的非农劳动时间不能超过农户家庭可以利用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农业劳动投入时间之差。(9) 式是耕作制度约束条件,不同的耕作制度对各农作物生产规模会形成不同的制约关系,即各后继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之和不能超过紧前农作物的播种面积之和;(10) 式是多样化约束条件,农户进行多元化生产的各作物的规模应当处于一个适当的区间范围之内,其 α 、 β 为模型假定的生产规模系数的上下限;(11) 式是基本粮食需求约束条件,根据农民种粮的传统习惯,家庭的口粮需求仍以自产粮食为主,且必须满足农户必需的粮食储备以及粮食生产中的部分种子用粮。

二、数据来源及“典型农户”基本情况

本文分析所用数据来源于 2010 年 3 月至 5 月对安徽省宣州区朱桥乡塘溪村的实地调查,内容涉及 2009 年农户家庭收支、投入产出、劳动力分配、农业生产、粮食补贴等方面的详细情况。塘溪村是朱桥乡下辖的农业大村,耕地面积 380 公顷,8 个村民小组,240 余户,主要是以种植业生产和外出打工为主。种植业生产涉及到的大田农作物品种有水稻、西瓜、黄豆、芝麻、棉花、小麦、油菜;外出打工是农户家庭剩余劳动力就业的主要形式,其外出打工收入在非农收入中占有绝对的比重。调研采取随机抽样的方式,每个村民小组随机抽取 15 户农户,共调查了 120 户农户,其中以农业收入为主的农户有 54 户,占样本农户总数的 45%。之所以选择安徽省朱桥乡塘溪村作为调查研究的对象,首先,宣城是安徽省的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且朱桥乡历来被称为宣城的粮仓,塘溪村是朱桥乡下辖的农业大村,种植的农作物品种

丰富;其次,塘溪村农村剩余劳动力外出打工就业现象普遍,因此,研究塘溪村农户在粮食补贴政策背景下的生产行为优化反应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安徽省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

为了使模型的分析对象具有较强的代表性,本文实证分析选用的农户不是某一具体的调查农户,而是基于调查地区的农户实际调查资料,构建能代表调查地区整体情况的一般意义上的农户,称之为“典型农户”。“典型农户”所拥有的劳动力、土地及资金等生产要素水平,由该地区样本农户的简单平均数来确定,各农业生产项目所需的物质资本、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投入及每种产品销售价格及收益等指标分别由该地区样本农户的平均值来确定。

表 1 反映的是朱桥乡塘溪村“典型农户”的家庭情况。塘溪村“典型农户”的家庭劳动力数量为 2.88 人,占家庭总人口的比例为 57.6%;农业劳动力的数量为 1.80 人,常年从事非农劳动力的数量为 1.08 人;2009 年家庭耕地总面积是 0.853 公顷,家庭总收入为 26 452.94 元,其中种植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25.61%,外出打工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 66.82%。

表 1 “典型农户”的基本情况(2009 年)

家庭情况	数据
家庭总人口/人	5.00
家庭劳动力数量/人	2.88
农业劳动力数量/人	1.80
常年从事非农劳动力数量/人	1.08
家庭耕地面积/公顷	0.853
耕地块数/块	6.85
家庭总收入/元	26 452.94
种植业收入/元	6 776.47
外出打工收入/元	17 676.47
户主平均年龄/岁	52.47
户主受教育平均年限/年	6.88

根据实地调查资料整理。

实地调查中发现,即使在自然、地理及社会文化传统相同的同一地区的农户,所种植的作物品种也不完全相同,存在户与户之间的差异。因此,虽然单个农户实际种植的农作物数量并不是很多,但由于户与户之间差异,可以产生多种作物轮作方式,使得农户在种植决策中拥有多样化的项目选择空间。本文选取至少 10% 的调查农户在实际农业生产中的所采用的生产项目作为“典型

农户”的潜在生产项目,塘溪村“典型农户”的潜在生产项目包括西瓜、早稻、中稻、晚稻、芝麻、棉花、黄豆、油菜以及小麦(图 1)。

从图 1 显示的朱桥乡塘溪村耕作制度安排可以看出,“典型农户”可以种植的农作物品种丰富,包括早稻、中稻和晚稻、西瓜、芝麻、黄豆、棉花、油菜以及小麦。在粮食补贴政策的影响下,“典型农户”基于收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生产优化组合,一方面,在种植业内部调整种植结构,配置生产要素资源;另一方面,在种植业和外出打工活动之间配置家庭劳动力资源,谋求实现家庭收入最大化。

三、粮食补贴政策实施绩效的模拟研究

利用上面构建的农户模型,模拟粮食补贴政策在补贴标准、农产品和要素价格以及土地经营规模变化情景下对“典型农户”家庭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的影响,据此客观评价粮食补贴政策的实施效果。本文调研数据反映的是农户家庭 2009 年的基本情况,此时所有样本农户均已经获得粮食补贴,因此,首先利用模型模拟农户在 2009 年的粮食补贴标准、土地经营规模以及产品

下对“典型农户”家庭粮食产量(“典型农户”的粮食产量指的是早稻、中稻、晚稻及小麦产量的加总)的影响。总体上看,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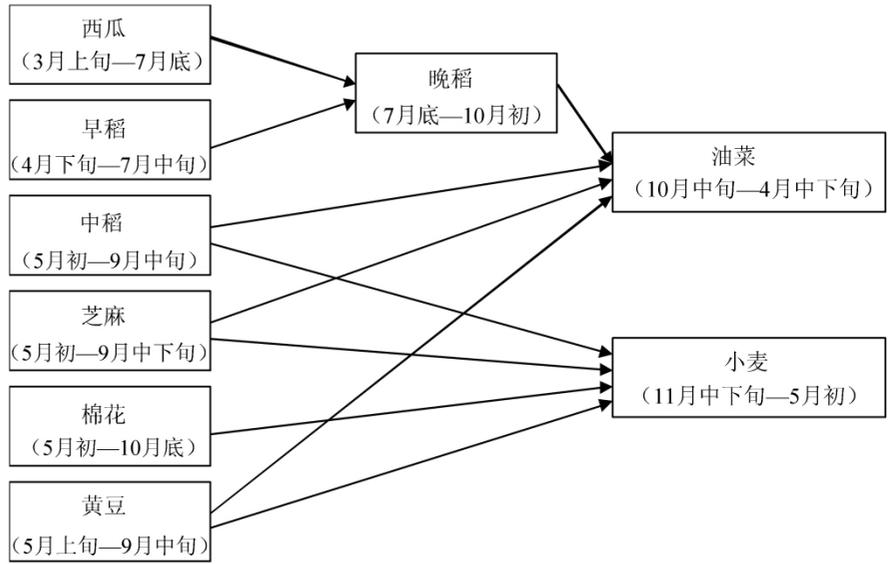


图 1 朱桥乡塘溪村农作物种植情况调查

贴对粮食增产的效应也越来越明显。从各个补贴项目来看,按照家庭承包土地计税面积发放的粮食直补对“典型农户”的粮食产量没有任何影响,这是因为粮食直补属于与生产脱钩的直接收入支持,与实际种植的作物品种和面积无关,对农户生产行为决策没有影响。按照实际种植面积发放的农资综合直补和良种补贴(安徽省宣州区 2009 年的粮食补贴标准如下:粮食直补为 193.5 元/公顷;农资综合直补 844.5 元/公顷,小麦、早稻、中晚稻的补贴标准相同;良种补贴为早、中稻 150 元/公顷,晚稻 105 元/公顷,油菜 150 元/公顷。

表 2 粮食补贴标准提高对“典型农户”粮食产量的影响

补贴强度	粮食直补		农资综合直补		良种补贴	
	/%	/kg	/%	/kg	/%	/kg
标准提高 20%	0	0	0.52	43.34	0.20	15.74
标准提高 40%	0	0	1.04	86.68	0.40	31.48
标准提高 60%	0	0	1.74	144.47	0.67	52.47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和要素价格水平下的最优生产情况,并以此为基期值。对各种不同情景下的粮食补贴政策绩效的模拟均是在此基础上,相应变化模型中的目标函数及相关参数,得出不同情景条件下的模拟值,并与基期值进行对比。

(一) 粮食补贴政策的“产量效应”

表 2 反映粮食补贴政策在不同补贴强度情景

其中粮食直补按农业税计税土地面积发放,农资综合直补和良种补贴在计税土地面积基础上按照粮食作物的实际种植面积核算发放)对增加粮食产量的效应明显。

表 3 反映粮食补贴政策在农产品(农产品价格变动,不仅指粮食价格的变动,而且包括“典型农户”生产的其他农产品的价格变动)和生产要

表3 价格水平变动对“典型农户”粮食产量的影响

价格水平	补贴标准提高 20%		补贴标准提高 40%		补贴标准提高 60%	
	/%	/kg	/%	/kg	/%	/kg
农产品价格上涨 10%	3.17	264.46	3.74	312.01	4.51	376.25
农产品价格上涨 20%	2.52	210.23	3.10	258.62	3.86	322.02
农产品价格上涨 30%	1.88	156.84	2.46	205.23	3.22	268.63
要素成本增加 10%	0.32	26.70	0.89	74.26	1.19	99.28
要素成本增加 20%	-3.85	-321.19	-2.58	-215.23	-1.56	-130.14
要素成本增加 30%	-10.01	-835.09	-8.92	-744.16	-6.13	-511.40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表4 土地经营规模变动对“典型农户”粮食产量的影响

土地经营规模	补贴标准提高 20%		补贴标准提高 40%		补贴标准提高 60%	
	/%	/kg	/%	/kg	/%	/kg
扩大 5%	0.82	68.41	1.54	128.48	2.04	170.19
扩大 10%	2.19	182.70	3.16	263.63	4.11	342.88
扩大 15%	3.54	295.33	4.33	361.23	6.91	576.47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素价格变动情景下对“典型农户”家庭粮食产量的影响。农产品和生产要素的价格水平与农户的生产收益密切相关,作为理性生产者的农户,根据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变动状况,调整农业生产结构。

从产品价格变动水平来看,随着粮食等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典型农户”粮食产量随之出现增加。并且伴随着粮食补贴标准的提高,粮食产量将会较大幅度增加。总体上看,粮食产量随着价格的提高而增加,而且在提高农产品价格和粮食补贴标准政策措施的共同作用下,粮食产量增加的幅度较大,优于实行单一的提高农产品价格或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对粮食增产的促进效应。

从投入要素成本变动水平来看,随着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增加,粮食产量随之出现较大幅度地下降,这可能是因为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增加进一步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要素成本增加一定幅度,粮食产量开始出现负增长,尽管随着粮食补贴标准的提高,粮食产量下降的幅度有所减缓,但从整体上看,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产量的影响远远小于生产要素成本增加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因此,必需坚持粮食补贴政策与控制农资等生产要素成本上涨相结合,确保真正发挥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民种粮的激励效应。

表4反映粮食补贴政策在土地经营规模变化情景下对“典型农户”家庭粮食产量的影响。随

着农业机械化程度的提高、农村土地流转市场的发展,呈现土地规模化经营的趋势。“典型农户”家庭耕地规模的变化,对粮食生产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从土地经营规模来看,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粮食产量增加的幅度随之上升。如果在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同时相应的提高粮食补贴标准,粮食产量增加的幅度将会较大幅度提高。总体上看,不管在何种粮食补贴标准水平下,“典型农户”家庭粮食产量都随着土地经营规模扩大而增加,而且在加快土地流转、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和提高粮食补贴标准的共同作用下,粮食增产的效应更加明显,优于实行单一的粮食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的促进效应。

(二) 粮食补贴政策的“收入效应”

表5反映粮食补贴政策在不同补贴强度情景下对“典型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总体上看,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粮食补贴促进农户增收的效应更加明显,而且按照家庭承包土地计税面积发放的粮食直补虽然不能直接促进粮食生产,但能直接增加“典型农户”家庭收入。

表6反映粮食补贴政策在农产品价格以及投入要素成本变动情景下对“典型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作为理性生产者的农户,根据产品和要素市场的价格变动状况,合理配置家庭要素资源,谋求家庭收入最大化。

表 5 粮食补贴标准提高对“典型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补贴强度	粮食直补		农资综合直补		良种补贴	
	1%	1元	1%	1元	1%	1元
标准提高 20%	0.08	33.02	0.57	235.26	0.11	45.40
标准提高 40%	0.16	66.05	1.15	474.66	0.21	86.68
标准提高 60%	0.24	99.07	1.93	796.61	0.35	144.46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表 6 价格水平变动对“典型农户”家庭总收入的影响

价格水平	补贴标准提高 20%		补贴标准提高 40%		补贴标准提高 60%	
	1%	1元	1%	1元	1%	1元
农产品价格上涨 10%	0.77	317.82	1.52	627.38	2.53	1 044.25
农产品价格上涨 20%	2.31	953.45	3.16	1 304.29	4.08	1 684.02
农产品价格上涨 30%	5.16	2 129.79	6.03	2 488.88	7.25	2 992.44
要素成本增加 10%	-4.12	-1 700.53	-2.83	-1 168.08	-1.06	-437.51
要素成本增加 20%	-5.21	-2 150.42	-4.44	-1 832.61	-2.40	-990.60
要素成本增加 30%	-6.13	-2 530.16	-5.04	-2 080.26	-3.54	-1 461.14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表 7 土地经营规模变动对“典型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

土地经营规模	补贴标准提高 20%		补贴标准提高 40%		补贴标准提高 60%	
	1%	1元	1%	1元	1%	1元
扩大 5%	0.68	280.55	0.74	305.30	0.83	342.43
扩大 10%	1.06	437.32	1.22	503.34	1.30	536.34
扩大 15%	1.10	453.83	1.36	561.10	1.69	697.24

根据模型计算结果整理。

从产品价格变动水平来看,随着农产品价格的提高,家庭收入也随之不断增加。如果在提高农产品价格的同时,相应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家庭收入增加的幅度会更大。补贴标准从提高 20% 到提高 60%,“典型农户”家庭总收入从增加 317.82 元到 2 992.44 元,增长幅度从 0.77% 上升到 7.25%。总体上看,家庭收入随着产品价格的提高而增加,而且在提高农产品价格和粮食补贴标准政策共同作用下,家庭收入增加的幅度较大,优于实行单一的提高农产品价格政策或提高粮食补贴标准政策对农户增收的促进效应。

从投入要素成本变动水平来看,随着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增加,家庭收入随之下降。尽管随着粮食补贴标准的提高,家庭收入下降的幅度有所减缓,但从整体上看,粮食补贴政策对“典型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远远小于生产要素成本增加对家庭收入的影响。因此,必须加强对生产要素价格的市场监管,控制生产要素投入成本的提高,确保粮食补贴政策真正起到保障种粮农民收益,

促进农民增收的作用。

表 7 反映粮食补贴政策在土地经营规模变化情景下对“典型农户”家庭收入的影响。土地流转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促进规模化经营,降低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农业生产收益。随着土地经营规模的扩大,家庭总收入也随之增加,而且在扩大土地经营规模和提高粮食补贴标准的共同作用下,家庭收入增加的幅度会更大,优于实行单一的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增收的促进效应。

五、结论及政策启示

农业政策通过微观农户的生产行为实现政策传导,本文基于农户调查数据,构建农户家庭生产行为模型,模拟研究粮食补贴政策在不同情景条件下对“典型农户”家庭生产优化反应行为的影响,从粮食产量和家庭收入两个角度客观评价粮食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研究表明:

第一,从“产量效应”来看,按照计税面积补贴的粮食直补对农户粮食生产没有激励作用,按

照实际种植面积补贴的农资综合直补和良种补贴对农户粮食增产的促进效应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而增强;随着农产品价格的上涨和土地经营规模的提高,粮食补贴政策促进粮食增产的效应也更加明显;随着生产要素成本的增加,促进粮食增产的效应明显下降,并且补贴政策对粮食增产的促进效应远远小于生产要素成本增加对粮食产量的负面影响。

第二,从“收入效应”来看,随着补贴标准的提高,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增收的促进效应增强;在提高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和扩大土地经营规模的条件下,补贴政策促进农户增收的效应更加明显;随着要素投入成本的增加,农户家庭收入明显下降,并且生产要素成本增加对家庭收入的负面影响超过粮食补贴政策对家庭增收的正面效应。

根据研究结果,得出以下几点政策启示:

参考文献:

- 第一,完善粮食补贴方式,实行按种植面积挂钩的粮食补贴政策。虽然挂钩补贴属于WTO规则限制的“黄箱”政策,但结合中国的“微量允许”标准和国内粮食增长的刚性需求,粮食主产区实行挂钩的粮食补贴政策有助于保障国家的粮食安全。
- 第二,逐步提高粮食补贴标准,加大对种粮农户的补贴力度,提高种粮农民粮食生产积极性,促进粮食生产发展。
- 第三,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加快耕地向种粮大户集中,推动粮食规模化生产,提高粮食生产规模效益。
- 第四,逐步建立粮食补贴与农产品价格、农资价格的联动机制,把粮食补贴标准与粮食价格、农资价格的变化联系起来,抵消生产要素成本上涨对粮食补贴政策实施效果的负面影响。
- [1]张照新,陈金强.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框架、问题及政策建议[J].农业经济问题,2007(7):11-17.
- [2]张海阳,宋洪远.农户的种粮行为与政策需求:对粮食主产区6县市300多个农户的调查分析[J].改革,2005(4):54-60.
- [3]张红玉,赵俊兰.我国粮食补贴政策的增产路径及其优化[J].学术交流,2008,172(7):87-91.
- [4]田建民,孟俊杰.我国现行粮食安全政策绩效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10(3):11-15.
- [5]梁世夫.粮食安全背景下直接补贴政策的改进问题[J].农业经济问题,2005(4):46-48.
- [6]李鹏,谭向勇.粮食直接补贴额政策对农民种粮净收益的影响分析:以安徽省为例[J].农业技术经济,2006(1):44-48.
- [7]王姣,肖海峰.中国粮食直接补贴政策效果评价[J].中国农村经济,2006(12):4-12.
- [8]张建杰.惠农政策背景下粮食主产区农户粮作经营行为研究:基于河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7(10):58-65.
- [9]蒋和平,吴桢培.湖南省汨罗市实施粮食补贴政策的效果评价:基于农户调查资料分析[J].农业经济问题,2009(11):28-32.
- [10]翁贞林,朱红根,张月水,等.种稻大户稻作经营绩效及其影响因素实证分析:基于江西省8县(区)619户种稻大户的调研[J].农业技术经济,2010(2):76-83.
- [11]Hennessy D A. The production effects of agricultural income support policies under uncertainty[J]. American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1998, 80(1):46-57.
- [12]Gohin A. Assessing cap reform: sensitivity of modeling decoupled policies[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2006, 57(3):415-440.

(责任编辑:翁贞林,英摘校译:吴伟萍)